

南北朝文学

骆玉明 张宗原 著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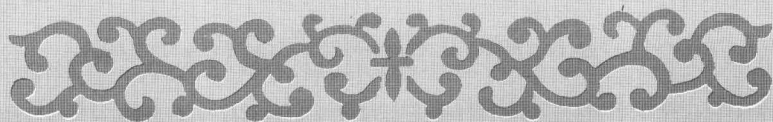


南北朝文学



骆玉明 张宗原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荣显
钱 江
封面设计 马世云

南 北 朝 文 学
(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丛书)

骆玉明 张宗原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跃进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义兴印刷厂印刷
合肥南方照排部照排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50 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2 000

ISBN 7-5336-0560-8/1·36

定价:10.3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公元3世纪末，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东汉后期以来长久的战乱和分裂之后，由司马氏的西晋王朝重新实现了统一。但不过二十多年，至4世纪初，西晋王朝又陷入宗室内部争夺政权的“八王之乱”，在自相斫斫以至虚弱不堪之际，又遭受到乘机崛起的匈奴族政权——刘渊、刘聪父子的汉王朝——的凶猛攻击，西晋政权终于土崩瓦解。在此同时，发生了一场胡汉移民的狂潮。原先居于西北地带的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而汉族，尤其是它的上层，则纷纷南下。公元317年，晋宗室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方建立政权，史称东晋。自此，汉族的政治和文化离开了哺育它成长的中原大地，历经宋、齐、梁、陈四代，一直偏安江南一隅。大河上下，则长期被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经所谓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与西魏并立时期和北齐与北周并立时期，迄隋，最后由隋统一了中国。隋二世而亡，至公元618年，李渊建唐，历史又开始了新的一页。本书将要叙述的，就是东晋至隋末这三百年间文学发展流变的情况，其主体是南方的文学。——这是由历史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

就通常的历史分期来说，所谓南北朝只是指南方的宋、齐、

梁、陈四代和北方的北魏、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几个朝代。但为了保持必要的连贯性与完整性，本书在前后都有所延伸。我们很难在东晋与刘宋之间划一条界线，不但因为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家都跨越两代，而且从整个时代背景、地理与民俗的环境以及作家的心理状况来说，也无法割弃东晋来谈南朝的文学。况且在南北对峙的意义上，东晋本不妨称为南朝。杜牧诗云：“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原也是这样看的。至于把隋代文学也囊括在内，则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南北朝文学的演变情况以及它如何伸展到唐代。总之，文学的分期与历史的分期不尽相符，想来是可以允许的。比如通常所言“建安文学”，就并非只是指汉献帝建安年间的文学。

南北朝文学，由于主导权掌握在帝王和贵族的手中，大部分文人的生活与普通民众是相脱离的，同时也由于他们的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影响，所表现的，大抵只是他们自身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趣，而很少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情况。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继承了东汉末以来的传统，思想比较自由活泼，艺术的气氛颇为浓厚，因而文学也得以繁荣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文学创作受到了极大重视，文学观念取得了重大进展，文学批评出现了空前繁荣，文学题材也有许多新的开拓，文学形式经历了复杂的变化。尤其是诗歌，如果说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是由建安文人奠定了基础，那么只有经过南北朝，这种地位才得到充分的巩固，以至无可动摇。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也主要是在南北朝时代确立的。唐人固然也做了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工作，但这已是瓜熟蒂落了。

颇为奇怪的是：自古以来，南北朝文学就受到特别激烈的评

击,乃至在整体上遭到基本的否定。并且,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现代人的评论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后代文学追求新的发展,必然要对前代的文学加以批判和扬弃,特别是对其明显的缺陷和偏颇加以否定,这里面包含着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儒家文学观的影响。按照这种观念,文学作品和普通实用的文章之间不存在根本区别,一切文章都只是统治者用于政治和伦理的工具,文学并没有它自身的独立价值。借用后人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说,就是“文以载道”。文好比是一辆车,是用来运载“道”的,倘若不能起这种运载工具的作用,它的存在就成为多余的了,乃至是一种罪恶。现代人在评判古代文学作品时,往往也沿袭了封建时代正统的文学观,错误地、片面地用政治标准和伦理标准去衡量文学,而且这些标准本身,和古人也未必有多少区别。南北朝文学总的说来,是明显偏离了儒家文学观的轨道的,正由于这一点,它受到了强烈的声讨。举例而言,自古及今,人们常用“绮靡”、“轻艳”、“纤巧”、“诡怪”之类的词语来概括南北朝的文风,并以此作为否定它的根据。但是,既然文学的风格理应是多样化的,何以这样的风格就罪在不赦,必欲扫荡之而后快呢?其实,这些概念看起来似乎是艺术的、审美的评判,实际上却是伦理的评判。封建伦理要求人自我约束,以谨厚庄重为君子风范,而文章风格,无论从反映作者的道德修养来说,还是从对于读者的影响来说,都必须与之相适应。以此为衡量标准,上述的风格就显得很不够格了。隋代所谓大儒王通在他的《文中子》中一口气骂倒许多南北朝文人,可以用来作为一个例证:

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

文治，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通常作均)、孔稚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使得人们对南北朝作家、作品的看法，往往带有偏颇之处，而且对这一段文学史的认识，也往往是断裂的、破碎的。

首先是文学的发展过程被切断了。通常人们对建安文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也有一些极端的教化中心论者，把《诗经》以后自屈原、宋玉至南北朝的文学统统加以否定)，而认为西晋以后，尤其是到了南朝，文学就衰退了、堕落了。此后唐代文学又被看作完全是在反对南北朝文学的基础上兴起的，似乎从唐人复兴古道的呐喊中，能够得出他们扫空前代风习而直承汉魏的结论。然而，如同其他历史现象一样，文学也是延续中变革，在变革中延续的。建安文学的许多因素，在晋南北朝被保存或以此为基础演化着，而南北朝文学对唐文学的影响，甚至更为深远重大。显而易见，这是诗歌形式之类的继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后人所称颂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无不吸取了南北朝文学——包括公认最糟糕的宫体文学——的许多特点。至于唐人对南北朝文学的抨击，原因颇为复杂。有些是出于文学发展的要求，如本文在前面所述的那样；还有的是因为这样一种历史上惯见的现象：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伴随着对前代政治的

否定,往往也从理论上对前代的文化加以通盘否定,以昭示“圣朝”的光明。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因为在唐代曾一度兴起重建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运动。但这三者客观上都未曾真正造成对南北朝文学的排斥。文学的发展本身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继承同样是重要的。出于政治原因对前代文化的全盘否定,实际上未必能够照此实行。至于唐代的儒学复兴,对当世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并没有强大的影响,否则唐诗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面貌。所以我们讨论南北朝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就不能完全听信唐人自己的宣言,而必须从他们的实际创作中寻找结论。

其次是割裂了个别作家与整个时代的关系。像陶渊明、鲍照等人,人们往往只是肯定、强调他们突出流俗的一面,而忽视他们与整个时代风气的一致性。但事实上,优秀的作家只能高于他的同时代人,而不能超越时代对他的约束。在同样的时代氛围中,往往最伟大的作家与最平庸的作家之间,也不乏相似之处。与此相关联,有时一个作家本身也被割裂地看待,他的某些特点,某些作品被抽取出来加以夸大,从而掩盖他的整个面貌。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绚丽多彩的时期,这本是当时文学创作繁荣的直接结果。像《文心雕龙》,原本带有写作指南的意味,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当然不可能与整个文学思潮脱离。但人们却常常把南朝的文学批评置于南朝文学创作的对立面,认为存在着创作衰微而批评兴盛的现象,甚或认为刘勰用骈文写的《文心雕龙》是反对骈文的。

以上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笔者在这本小书中能够解决的。但提出并注意这些问题,还是有其必要性。在以后各章中,笔者

将努力注意不是用今天的文学标准去衡量古人,而是尽可能客观地指出他们较之前人在哪些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对于后人(尤其是唐人)有何种影响,并尽可能全面地(只能是粗略地)叙述南北朝文学的整体面貌。当然,也有必要指出南北朝文学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偏颇。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南北朝文学思潮	1
第一节 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1
第二节 文学集团的活跃.....	6
第三节 趋新求变的文学倾向.....	9
第四节 华丽的美学风貌	14
第五节 悲哀的抒情基调	18
第二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24
第一节 南方乐府民歌	24
第二节 北方乐府民歌	37
第三节 乐府民歌的影响	44
第三章 东晋与宋代文学	46
第一节 本时期文学的基本趋势	46
第二节 玄言诗风	48
第三节 陶渊明	54
第四节 谢灵运 颜延之	65

第五节	鲍照	77
第六节	东晋与宋代小说	92
第四章	齐、梁、陈文学	104
第一节	本时期文学的基本趋势	104
第二节	沈约 谢朓	107
第三节	江淹 孔稚珪	119
第四节	何逊 吴均 丘迟	124
第五节	萧氏兄弟及宫体文学	133
第六节	《文心雕龙》与《诗品》	145
第七节	徐陵 阴铿	156
第八节	陈后主宫廷文学集团及江总	163
第五章	北朝与隋代文学	168
第一节	北朝及隋代文学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68
第二节	温子升 邢邵 魏收	172
第三节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176
第四节	王褒 庾信 颜之推	187
第五节	卢思道 杨素 薛道衡	205
第六节	隋炀帝及其宫廷文学集团	214

第一章 南北朝文学思潮

第一节 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汉末建安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随着汉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学的衰微,文学也逐渐摆脱了过去作为经学附庸兼宫廷装饰的地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表现他们在这苦难世界中寻求解脱的渴望和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由此,就形成了第一次文人文学的高潮。《宋书·臧焘传》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概括了这一时期文人的兴趣从经学转向文学的实际。《文心雕龙》、《诗品》对建安文学盛况的称述,也都不吝笔墨,详加评述。毫无疑问,文学创作的兴盛本身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重视。

不过,从理论认识来说,旧的传统观念在这时仍有相当影响。建安文人普遍为人生短促的恐惧所压迫,而把建功立业、垂名后世视为生命的延续。曹操著名的《短歌行》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发唱,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收结,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曹植作为建安时期卓绝一世的文学家,最向往的也是政治上“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倘不能遂愿,则退求其次,“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即通过撰写政治、伦理的专门论著,来实现愿望。对文学,他却说:“辞赋

小道,固未足以扬揄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左传》里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乃“圣人”之事,非常人所敢自许,也非重实效的建安时人所感兴趣。他们追求的是立功与立言,而这“立言”通常与诗赋之类是无关的。所以曹植一面精心写作华美的诗赋(而且事实上他也并未撰写什么专门论著),一面却对此表示轻视,这正是新旧风气交替之际的矛盾现象。曹丕的态度与曹植有所不同。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的“文章”涵意较广,既包括政治和伦理的专著,也包括诗赋。但这种说法仍然孱杂了陈旧的儒家观念。所谓“经国之大业”,是说文章是政治、教化的一部分;所谓“不朽之盛事”,就是儒家以立言为不朽之说。所以用来解释政治与伦理的专门论著说得通,用来解释建安文人所喜爱的抒情性诗赋(如曹丕自己的《燕歌行》)却说不通,这同样是新旧风气交替时期的矛盾现象。而且总是来说,曹丕对政治和伦理的专著(即他的《典论》一类)之重视,是超过诗赋的。他说徐干著有《中论》,足以传世,其人将藉此而不朽(《与吴质书》),便可证明。在这一点上,他与曹植仍有相近之处。后来明帝曹睿将《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及《三少帝纪》裴注),是深察乃翁之苦心的。

到了西晋,文学创作继续保持繁荣局面,对文学的认识则有进一步的发展。《典论·论文》所“论”之“文”,还是广义上的文章,陆机《文赋》虽未明言他所说“文”的性质与范围,但讨论的问题着重于创作过程中感兴、想象、艺术技巧等等,可见他所说的主要是抒情性、艺术性的文而非理论性的文。也就是说,陆机较之建安文人,更重视文学。所以他才能第一次深入地揭示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与灵感活动这一类重要而复杂的现象。就理论

的深度来说,《典论·论文》与《文赋》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东晋知识分子的热情,曾一度转入哲学(玄学)。宋以后,文学创作受到更普遍的重视,文学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两汉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学,固然出于统治者的提倡,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获得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魏晋以后,士族门阀制度日益稳固,士族中人在政治上的前途主要是由他们高贵的出身和权利结构的实际势态决定的。这种世袭的封建贵族,原则上并没有必须掌握的某一特长。但文化素养仍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实行统治的需要,而且是士族阶层在精神生活方面高贵于其他阶层的标志。对于依赖门阀制度维系政权的皇室来说,这也是同样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东汉末以来压迫着知识分子心灵的人生短促的恐惧始终存在,探求个人存在意义,抒发性灵,也是当时文人普遍的精神需要。因此,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趣味,比较集中于哲学、艺术和文学。尤其是文学,进而言之是其中的诗歌,渐渐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这种风气在后代也一直延续下来,有一定地位的人几乎没有不能写一点诗的)。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从上到下,普遍以能文自矜,也就不足为怪了。南朝的皇帝、宗室,很多是能够从事创作和批评的,并且往往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而成为一个时期中文学的中心。宋之文帝、孝武帝、明帝、建平王弘、庐陵王义真、临川王义庆、江夏王义恭;齐之高帝、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随王子隆;梁之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元帝;陈之后主;隋之炀帝,莫不以爱好文义、喜招纳文士著称。并且其中一些人是南朝最有影响的作家与批评家。至于高门大族中,更是济济多士。江左以陈郡谢氏、琅琊王氏最号显赫。谢氏中有作品见录于《文选》的,便有谢混、谢瞻、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六人。论王氏,则王筠《与诸儿书》尝自夸:“史

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其他如《南史·刘孝绰传》言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余人,并能属文,为近古所未有。以上所列,可见一斑。

南朝对文学的重视,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有特出的反映。《南史·宋文帝纪》载,文帝于元嘉十五六年,先后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同书《宋明帝纪》载,明帝于泰始六年立总明观,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这是历史上文学与其他诸学分立自为一科的开始。再以正史的记载来看,到刘宋时范曄著《后汉书》,才首次专立《文苑传》,梁萧子显著《南齐书》,也专立《文学传》,后世遂沿为体式。沈约所著《宋书》虽无专传,但在《谢灵运传》后特附长篇大论,论述自先秦迄宋历代文学演化的情况,则亦以文学为史书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以目类学分类而言,自刘歆《七略》始,本以《诗赋》为一类,至宋时王俭撰《七志》,认为“诗赋”之名不能兼包各种文章,乃易名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梁阮孝绪撰《七录》,又以文人词章,普遍汇为文集,复易名为《文集》(后世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的集部,即承此而来)。还有,众所周知,现存古代第一部历朝文学作品的选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第一部历朝诗歌的选集是徐陵在梁代编撰的《玉台新咏》。这些都反映了文学受到重视、独立为一科的史实。

由于文学的兴盛和对文学的重视,由于有了文学自为一科的意识,因而出现文学批评的繁荣。其详情在以后各章再谈,这里要涉及的是从当时文笔的判分所反映的文学观的发展。魏晋时文章日繁,就引起对各种文体特点的区分,这始于《典论·论文》和《文赋》。至南朝,文体区分愈趋精细,《文心雕龙》所论有三十三类,《文选》所列则有三十七类。从对文体细致的、具体的

分类,又进展到对各类文体总的性质的归纳与区分,因而使文学的性质逐渐显得明确。

《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是从有韵无韵来把各种文体区分为两大类。此种观念大致起于东晋,到宋代成为较普遍的认识。《文心雕龙》论述各种文体时,已经按照文笔两大类排列了。有韵无韵,是从形式着眼,但内中也隐含着性质的区分。因为有韵之“文”,主要是诗赋、颂赞、箴铭、碑诔这些最注重文彩、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无韵之“笔”,则主要是史传、诸子、论说、章表之类,虽不排斥文彩,但更倾向于实用的文体。但话说回来,若从对文学性质的认识来说,这样的划分毕竟是含糊的。属于笔的一些文体,在有些作家写来,同样可以很有文彩,感情浓郁,甚至可以押韵。所以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的论述,就格外值得重视了: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官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同样是讲文笔的区分,萧绎所言与刘勰等人所言,有根本的区别。按南朝本来的观念,文与笔都属于“文学”的范畴。萧绎则试图通过文笔的判分,把实用的文章和艺术的、抒情的作品加以区别。他要求于文的是三点:修辞之美、声调音律之美、抒情

性。也就是说,他是从美感特征和抒情特征来认识文学的。这虽不是全面的,但至少是在几个重要的方面接近了文学的本质。从当时文学的实际状况来看,戏剧尚未产生,叙事诗尚不发达,小说尚未成熟而习惯上又看作是史传的余绪,因此从虚构特征来认识文学实属困难。所以应当说萧绎的理论在当时条件下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否定萧绎的理论,也就是抹杀了南朝文学理论所达到的实际高度。

可惜的是,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理论虽然不无可取之处,但在文学性质的认识上,非但没有继承南朝的成就而有所发展,反而倒退到南朝以前的认识,以一个笼统的“文”来囊括所有文章,取消了实用文章与艺术、抒情之文的区别,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造成极大妨害。

第二节 文学集团的活跃

既然文学在社会上层受到普遍的重视,并且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必备的素养,那么文学必然要进入到他们的社交活动中去,作为一种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成为相互交往、沟通感情的媒介和高雅的娱乐工具。这样,就在某一群文人之间,或者,更多的是围绕着某个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形成一定的文学集团。建安时代,围绕曹氏父子,包括“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及其他一些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西晋时权臣贾谧门下的“二十四友”,包容了潘岳、陆机、左思、刘琨等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南朝文学的集团化现象较以前更为特出,择其要而言之:东晋前期,有居住会稽的一批名士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李充、支遁等人之间的文学交游(《晋书·王羲之传》)。穆帝永